

梁尚賢 著

國民黨與 廣東農民運動

廣東人民出版社



梁尚賢 著

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國民黨與 廣東農民運動

嶺南文庫編輯委員會

廣東中華民族文化促進會

合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民党与广东农民运动/梁尚贤著. —广州市: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4. 12
(岭南文库丛书)

ISBN 7—218—04763—7

I. 国… II. 梁… III. ①海陆丰农民运动—研究
②中国国民党—史料—1927 IV. K261.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41310 号

责任编辑	柏 峰
封面设计	智 达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台山市人民印刷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31
插 页	1
字 数	621 千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8—04763—7 /K·945
定 价	5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调换。

岭南文库顾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幼军	卢钟鹤	叶选平	任仲夷	刘斯奋
李兰芳	林 若	陈越平	杨资元	杨应彬
黄华华	黄 浩	萧如川	蔡东士	

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编：钟阳胜

主 编：朱小丹 岑 桑 (执行)

副主编：陈海烈 (执行) 曾宪志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卞恩才	卢子辉	冯伯秋	朱小丹
庄 昭	刘扳盛	朱仲南	李权时
李达强	李锦全	岑 桑	辛朝毅
张 磊	陈俊年	陈海烈	金炳亮
洪志军	胡守为	饶芃子	梁 钊
梁渭雄	黄尚立	曾牧野	曾宪志
曾昭璇	廖晓勉	颜泽贤	

“岭南文库”前言

广东一隅，史称岭南。岭南文化，源远流长。采中原之精粹，纳四海之新风，融汇升华，自成宗系，在中华大文化之林独树一帜。千百年来，为华夏文明的历史长卷增添了绚丽多彩、凝重深厚的篇章。

进入 19 世纪的南粤，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成为近代中国民族资本的摇篮和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启蒙之地，继而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策源地和根据地。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东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斗争中前仆后继，可歌可泣，用鲜血写下了无数彪炳千秋的史诗。业绩煌煌，理当镌刻青史、流芳久远。

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摧枯拉朽，奋发图强，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卓有建树。当中国社会跨进 20 世纪 80 年代这一全新的历史阶段，广

东作为国家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试验省区，被置于中国现代化经济建设发展的前沿，沿改革、开放、探索之路突飞猛进；历十年艰辛，轰轰烈烈，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空前伟绩。岭南大地，勃勃生机，繁花争簇，硕果累累。

际此历史嬗变的伟大时代，中国人民尤其是广东人民，有必要进一步认识岭南、研究岭南、回顾岭南的风云变幻，探寻岭南的历史走向，从而更有利于建设岭南。我们编辑出版“岭南文库”的目的，就在于予学人以展示其研究成果之园地，并帮助广大读者系统地了解岭南的历史文化，认识其过去和现在，从而激发爱国爱乡的热情，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高瞻远瞩，继往开来。

“岭南文库”涵盖有关岭南（广东以及与广东在历史上、地理上有密切关系的一些岭南地域）的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包括历史政治、经济发展、社会文化、自然资源和人物传记等方面。并从历代有关岭南之名著中选择若干为读者所需的典籍，编校注释，选粹重印。个别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译著，亦在选辑之列。

“岭南文库”书目为 350 种左右，计划在五至七年内将主要门类的重点书目基本出齐，以后陆续补充，使之逐渐成为一套较为齐全的地域性百科文库，并作为一份有价值的文化积累，在祖国文化宝库中占一席之地。

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
一九九一年元旦

序

陈铁健

将近半个世纪前的大学时代，我曾经有过对于文化思想领域盛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灿烂现实与辉煌远景的期待和渴望。谁知，1957年那一场号称“反右派”其实是反知识、反文化、反思想的巨变，把这一切美丽幻想打得粉碎。往后，我和我的同行前辈们便只能生活在不许思索、不准“腹诽”、不得拒绝接受往圣今哲的圣训指令，而只能诠释和宣扬这种圣训、服从这种指令的无可奈何的氛围中。学术圈中人，凡有不同思想者，必遭批、斗、禁、关、逐的命运。随之而来的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枯萎、苍白、贫乏和丑陋。其中，历史学遭遇的劫难尤厉，长期处于充当现实政治的注脚的附庸地位，无法挣脱空疏、僵化和虚假的境地。关涉重大历史问题的核心档案资料，长期被封闭秘藏，以利少数人垄断、割裂、断取、作伪，而又得以避过

被揭穿的尴尬。

然而，人总是要思考的。包括学者在内的文化人群体尤其以个性化思考即独立性的思考来开拓学术与文化；没有思考就没有学术与文化的创新，学术与文化便会成为腐臭的死水一潭。中国学术文化近二十多年的起死回生稍呈繁荣，正是学人独立思考摆脱僵化的表现。我的朋友梁尚贤教授以退休之年，得以获取更多的思索空间，在占有大量可靠的史料基础上，捕捉历史的新鲜话题，追寻被长期湮没的历史真实，为广东农运史辟出一块新的研究天地。

我与尚贤第一次见面，是1979年春天，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礼堂举行的一次史学研讨会上。由李新师主持的这一次会议，听众座无虚席。京城史学界人士大多到会。会议就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和拨乱反正中的史学敏感问题进行探讨。我讲完《重评〈多余的话〉》后，一位青年学者走上讲坛，以带有广东口音的普通话，就陈独秀问题发表意见。中等身材，浓眉大眼，精神饱满，声音洪亮，语言干净犀利，且很煽情。事后，从别人口里知道他是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的梁尚贤讲师。6月间，我到福建上杭才溪乡参加学术会议，在那里与时光、梁尚贤不期而遇。一周的会议和参观，我们多在一起谈天说地。最多的话题，还是十年动乱中学术界的厄运。尚贤的大嗓门，时光的沉思，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以后，党史学会的一些学术活动，我们不时相逢，尚贤都是会上的活跃分子。他心怀坦荡，豪爽直率，与之交往，可以直言无忌，没有一点心理隔膜。

80年代中期，尚贤希望到近代史所做事。我赞同他的选择，并向有关负责人推介。不久，尚贤到《近代史研究》杂志任职，并以优异的工作业绩，出任副主编。90年代初，我应邀为该刊写《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历史回顾和瞻望》一文，集中评点拨乱反正时期中国现代史领域的新成果，主旨在提倡黎澍先生一贯倡导的追求历史真实，反对伪史学，学术与现实政治应保持适当距离，不随风摇摆，拒绝充当变来变去的现实政治的奴仆。正直的史学家，应当为历史学走向科学而奋斗，“心之所善，虽九死而不悔”。文章最后，以黎澍先生关于史家道德的文字作为结语。刊出后，蒙众多同行赞许之余，也听到一些微词。外省一位党校的教师寄来一篇长文大加诛伐，从政治角度指拙文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并认定黎澍先生已是自由化之代表人物。尚贤请蒋大椿教授审读此文。大椿读后，嗤之以鼻。尚贤在退稿函中说，《回顾与瞻望》一文乃作者研究中国现代史数十年的学术体验和心得，于事于理都有根据，不宜从政治上曲解其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希望批评者从学术角度著文争鸣。编者、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良好关系，是刊物保持学术品味，不趋时应景，不受现实政治干扰的重要环节。尚贤以清醒头脑和周到方式，妥善处理此事，令我感佩。

从1991年起，尚贤以退休之年，关注1924—1927年间国民党与广东农民运动的关系，用十年时间东西奔波搜寻第一手资料，写成一部很有说服力的学术新作，推翻了流行几十年的大革命时期广东农民运动由中共包办的定论，把这一

历史课题的研究推进到一个全新境界，其功甚伟。近代历史学作为学术文化的重要领域，只有摆脱个人或党派的禁忌，把科学性放在第一位，追求历史真实，提供历史经验与教训，而不沦为“胜利者的宣传”，或充当现实政治斗争的工具，才有其存在的价值。尚贤的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它说透了国民党与广东农运的关系，达致一个新的认识；更在于它使人不再迷信某些流行于世的传统观点，不再固守某些似乎不可逾越的界限。相反，如果不超越那些被事实证明是过时的错误的结论，不突破那些蒙蔽读者阻碍学术发展社会进步的固有的保守的界限，那么历史必将继续若明若暗乃至晦暗不清。尚贤的研究工作，还有一层启示：历史研究永无穷尽。历史学家应该守定科学精神，坚持独立思考，不断发掘新史料，开拓新的领域，解析新的历史课题。如此反复探索，不断发现，不断破解，才会逐渐接近历史的真相，或历史的原质感。正是：

往事迷离未足奇，无疑之处应有疑；

似明若暗理还乱，研史当无穷尽时。

2003年9月18日，写于水南斋灯下。

前 言

1924—1927年的广东农民运动，是在国共合作的特殊历史环境下发生的，其成功与失败，均与国共两党有极密切的关系。这场对中国革命有过重要影响的农民运动，早就是海内外学者颇感兴趣的研究课题之一。

当这场运动还未落下帷幕之前，论述它的著作已经问世。一本是中共广东区委于1926年6月间编写的《广东农民运动报告》，是按照共产党领导广东农运的观点论述的，其中对北伐前广东农运的概况和农民协会的经验阐述尤多，对国民党的农运政策既有赞扬也有批评。^[1]另一本是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于同年10月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前编成的《中国农民运动近况》，则是按照国民党指导农民运动的观点撰述的，其中对广东农民运动的经过及党人对农民运动的误解与怀疑分析尤详，但绝不涉及共产党。^[2]两本论著，为后人提供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取向。尽管有此不同，但在充分肯定广东农

民运动的莫大劳绩，高度评价广东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的巨大作用上，两者是完全一致的。

1927年4月广东农民运动被镇压后，否定和丑化它的论调铺天盖地而来。9月，广州岭南大学张自强所著《广东农民运动》一书，由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出版。该书不受时论左右，能以较为客观的态度，独立考察广东农运发生的问题。此后多年，再无此类专门著作问世。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广东农民运动成为中国大陆各种版本的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教科书必谈的内容之一，但都是从中共领导的角度去阐释，不讲或很少讲到国民党与广东农运的关系。即便讲到国民党，也只是个陪衬，仅仅作为发展农运的有利条件或阻碍农运的不利因素被提及。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并无多少改变。

也是在20世纪的70—80年代，西方学者已有研究广东农民运动的论著问世，^{〔3〕}但多局限于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及共产党人的活动上，对国民党与广东农民运动的关系，甚少涉及。

与张自强的《广东农民运动》相隔60年后，1988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书名相同的《广东农民运动》（杨绍练、余炎光合著）。该书是以中共为主轴来论述的，只以很小的篇幅谈到国民党。全书共有5章21节，专门谈国民党的有1节另4个小标题。这已是难能可贵。此外，同年求实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农民运动纪事》（高熙著），1990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农民运动史》

(曾宪林、谭克绳合著)，同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大革命史》(王宗华主编)，1996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广州国民政府》(曾庆榴著)，1998年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国共关系七十年》(黄修荣著)，200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第二卷(萧超然主编)，都有相当篇幅介绍广东农民运动，并论及国民党。

应当说，对于共产党与广东农民运动的关系，中国大陆的史学界已有较为系统广泛的探讨。而国民党与广东农民运动的关系，迄今尚无系统深入的研究。无论在资料的编选，或史实的论述上，都过于简略，使人难以窥其全豹。除了一些人所共知的事情外，大量史实鲜为人知，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大多人云亦云或以讹传讹。本人多年来选取国民党与广东农民运动的课题加以研究，^[4]是因为这方面还有许多未弄清楚的问题，如国民党究竟做了哪些推动广东农运的事情，如何做的？国民党“一大”确定的农民政策是如何执行的，有过什么失误？国民党对农运发生的各种事件和问题是如何处理的？国民党对农运的态度前后是怎样变化的？等等。弄清这些问题，可补以往研究之不足。如果能在前人已大致弄清中共方面情况的基础上，进而把国民党方面的有关情况也弄清楚了，这将有助于较为全面客观地评价广东农民运动，评价国共两党在这场运动中的作用及由此产生的矛盾和纷争。

研究国民党与广东农民运动，如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其他课题一样，必须以大量第一手的历史资料为依据。

从1991年起，我用了近十年时间，断断续续地从当年公开出版的报刊书籍中，点点滴滴地收集到一批重要史料，并编成《国民党与广东农民运动大事记》（署名司马文韬）一份，交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的《近代史资料》陆续刊出。2000年至2002年，又先后赴广州、台北、南京搜集资料。尤其是在台北的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查阅到中央农民部有关广东农民运动的大批档案资料，最令我兴奋不已。

看了台北的这批广东农民运动的档案，我的感觉一是数量多，二是价值高。

就数量而言，我在广东省档案馆、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看到的资料数量，远远不能与之相比。由于其数量多，只能挑重要者全文或摘要抄录，而全文抄录者，即有数百件，足可以编成一厚本广东农民运动档案汇集。

就价值而言，较之当年报刊公开披露的文件，自有其无法比拟的独特之处。如从1924年3月起至1925年12月止，中央农民部每月都有一份工作经过报告，送交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与秘书处及其他各部的工作报告汇总，编成中央执行委员会通告印发各省党部。这1年又10个月共22篇工作报告，纪录着农民部每月干了一些什么事情，看似一篇篇流水账，但它如实反映了农民部组织和指导广东农民运动的具体情况，为客观评价农民部的工作提供了重要基础。这是其独特之处一。

又如中央农民部从1924年8月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

一届毕业生中选出 25 人为特派员，派往各县从事农民运动起，至 1926 年 3 月，已拥有特派员 122 人，他们的工作备受各方关注。按规定，特派员应经常向农民部报告工作。1924 和 1925 年的特派员报告，未见保存下来。惟有 1926 年保留下多达 45 份，为我们研究特派员的工作情况和他们对农村发生的各种事件的描述，提供了原始的记录。这是其独特之处二。

再如在完整保存的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纪录、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会议纪录、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议事录、中央各省联席会议议事录中，纪录了国民党中央多次开会讨论农民运动的大政方针及对重大事件和问题的处置意见，系统反映了国民党中央的决策过程，是深入研究广东农民运动的重要根据。这是其独特之处三。

曾任中央农民部部长的彭素民、廖仲恺、陈公博、甘乃光、邓演达等人，以及汪精卫、许崇智、蒋中正、宋子文等人，都留下了一些与广东农民运动相关的文稿，是研究国民党农民政纲和政策的实施过程的珍贵史料。这是其独特之处四。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中央政治会议、大本营秘书处、中央秘书处、中央农民部、广东省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总司令部、广东省政府等机构，发出过大量的函电、通告、训令等，这是研究党政军各系统如何处理广东农民运动中发

生的事件和问题所不可或缺的资料。这是其独特之处五。

参加农民部工作的跨党的共产党人彭湃、罗绮园、阮啸仙，以及从事基层农会工作的跨党的共产党人周其鉴、陈道周、钱维方、古大存等人，分别写给中央执行委员会或农民部长彭素民、廖仲恺、甘乃光的函电、报告和呈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共两党合作进行农民运动的状况，也是不可多得的史料。这是其独特之处六。

这批重要档案，加上我在北京、广州、南京收集到的资料，为重新全面审视广东农民运动提供了可能。

由于历史的原因，大陆学者与台湾学者对于广东农民运动的评估历来相左。

早在1926年中共广东区委编的《广东农民运动报告》中，即宣称广东区委下属的农民运动委员会（1924年10月成立）“指挥”了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省农民部和省农民协会。^[5]但如何“指挥”，则语焉不详。1983年该报告的主要部分重新公布后，^[6]大陆学者更以此为根据，证明中共独家领导了广东农民运动，虽然“指挥”之说多有漏洞，却无人提出疑义。^[7]

1927年国民党清党反共后，彻底否定此前的农民运动。1929年邹鲁所著《中国国民党史稿》出版后，所谓共产党“把持”、“包办”广东农民运动的说法，更成定论。多年来，台湾学者均以邹鲁的论述为蓝本，视广东农民运动为共产党人之专利品，讳言国民党人参与过广东农运，虽然守着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大批档案，却无人有兴趣加以研究。

近十几年，台湾学者的研究有了明显变化。一是长期尘封的中央农民部档案，终于开放供人查阅。1992年在吕芳上教授指导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郑建生的硕士论文《动员农民：广东农民运动之研究（1922—1927）》，就是利用这批档案所取得的第一个成果，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二是新出版的一些著作，如林玲玲的《廖仲恺与广东革命政府（1911—1925）》，^[8]对廖仲恺指导广东农运的事迹，已有较多的描述和较好的评价；陈永发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9]对广东农民运动和跨党党员的活动，也有较为客观的论述。

也是在近十几年中，为了确定国民党是否参与了和共产党是否单独领导了广东农运，我对大量史料进行了研究，终于弄清国民党并非没有参与、共产党亦非单独领导广东农运。经过审慎的考量，形成了这样一个基本的观点：广东农民运动，与这个时期的整个国民革命运动一样，是在国共两党合作下共同进行的，而国民党对广东农运的成功或失败，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根据我的研究，在长达三年多的广东农民运动中，国民党绝不是毫无作为，只能坐观其成败，仅被动地发生过一些影响，而不起什么实际作用（包括正反两方面的作用）。由于国共两党各自所处的地位不同，各自所起的作用也不同。有关农运的大政方针，始终由国民党中央制定掌握。如有关农民政纲和政策，重大问题和事件的处置，都是国民党中央决定的，^[10]由各级党部、政府和农民协会贯彻执行。农民协会的具体运作，则多由跨党的共产党人去完成。国民党的作